



明世宗朱厚熜

赵基◎主编

盛世君王

(上)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顺义

封面设计:席慧娟

名家藏书·盛世君王
明世宗朱厚熜(上)

编 著 者	赵基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邯郸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5000 千
版 次	2004 年 9 月修订第 2 版
印 次	2004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 张	450
标准书号	ISBN 7-80595-660-X/I · 262
总 定 价	960.00 元
本册定价	17.50 元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在世纪更替,风云变幻之际,中国封建王朝走向了灭亡,与之相伴随的皇帝也成为了历史。但数千年的中国历史,实际上也就是皇帝的历史;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皇帝曾经煊赫两千余年。上起始创“皇帝”名号的秦始皇,下迄末代皇帝溥仪。社会是进步的,皇帝终于被历史的烟云所湮埋。

本套丛书从不同的侧面对历朝历代皇帝及皇后进行了描述,有胸怀壮志的开国之君;有治国有方的盛世之君;还有居于乱世,有心治国而回天乏力的乱世之君,最后却在一帮伶臣的包围下沦为一个昏君;更有命运悲惨,身首异处的末代君王。苏轼曾做过一首词,其中有两句“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后世常拿“高处不胜寒”来形容皇帝的处境,既贴切,又含蓄。这是深通人情、对居高位者的匠心写照,又是身入孤绝之境的无奈何的喟叹,

凡为了追猎高位有做皇帝心愿的人在愿望目的达到之后,都免不了“高处不胜寒”的境地,如果以忤刻的心理处理与他人的关系,则所得到者恐非一个“寒”字了得,所谓不诚无物,则皇帝的遭遇犹如水中之花、镜中之月而已。幸与不幸,可质诸心而不可质诸纷繁之表面。

本书遵于历史,而又用艺术的手法,集知识与趣味于一体。内容充实,改变了以往历史题材书籍的生硬。适于广大中小学生阅读。

编 者

目 录

第一章	明代社会·····	(1)
第二章	入居大位 ·····	(15)
第三章	大礼之争 ·····	(42)
第四章	嘉靖新政 ·····	(96)
第五章	新政转轨·····	(148)



第一章 明代社会

距今 624 年前,在中国这块古老而文明的大地上,又兴起了一个封建王朝。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明朝。

明朝在中国历史上是很有特点的王朝。它建立在元末人民大起义之后,因而王朝要标榜自己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原正统王朝的继承者,以驱逐蒙古贵族残暴统治的救世主自居。并以此形成一个集聚社会力量实现全国统一的局面。同时也使蒙古贵族恢复在中原统治的企图破灭。从此明王朝得到稳定与发展,统治中国有 276 年之久。

明朝的奠基人是太祖朱元璋,他出身贫民。同我国历史上那些出身微贱的皇帝一样,首先是把自己变成贵族。而且要使这个朱氏贵族成为王朝的政治中心。皇帝是这个政治中心的中心,他的权力应当是绝对的,既要集地方权力于中央,也要集中央权力于自身。这种被集中起来的权力就是王朝的至高无上的皇权。在明太祖朱元璋统治时期,这种皇权就已形成,并得到加强。在朱元璋的主持下废各地行中书省而设地方三司,废中央的中书省丞相制,六部归皇帝直接领导。

盛世君王

在朱元璋之后是他的孙子朱允炆继位，但不几年就被他的叔父朱棣夺去皇位。朱棣是一个颇有作为的皇帝，一生做了几样对明朝的发展有重大意义的事。一是把废除丞相制后所带来的政治结构上不完善的地方，加以完善，初步形成内阁，结构成皇帝、内阁、六部这种政权形式。而且这种政权的基本形式，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的初年。二是把都城由南京迁到北京，但仍保留南京作留都。从此实施由北方控制南方的格局。实际上是北京、南京两点成一线，以达到南面控制东南财赋之区，北面防御严重边患的目的。这种格局一直保持到明朝灭亡。三是他改变了洪武时期与周边国家、地区的封闭关系，而采取了欢迎各国人民到中国来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往来的政策，其中包括像郑和下西洋那样的航海壮举，对加强与周边国家关系采取了主动的精神。但这种远航，由于超过了当时国力的负担条件，不得不在他的子孙作皇帝时采取紧缩政策时，停止下来。

永乐朝之后是仁宗的洪熙朝和宣宗的宣德朝。仁宗、宣宗父子已是明朝创业者的第三代和第四代了。这个在15世纪初年的亚洲第一大国——明王朝，却从第四代之后，开始出现危机，而步入衰微。

明初社会是在经济遭到战争的破坏之后，生产显示萎缩，经济活动呆滞。但是恢复经济，并使之走向发展，则又具备几个很好的条件。一是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战事已经停止，社会趋于安定。不久实现了全国的统一，使这种安定局面得到巩固。这是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得到恢复与发展的重要环境条件。二是元末战争造成大量无主荒田的存在，同时也造成大量流亡的劳动力的存在。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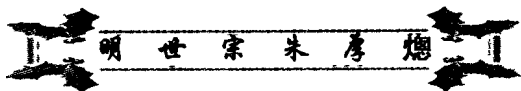
明世宗朱厚熜

亡者渴望得到土地，而土地又等待人去开垦。这是当时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最有利的条件。三是明初的封建专制政府运用它手中掌握的大量无主田地和最为强制的权力，实施一些有利于加快经济恢复进程的政策。比如奖励垦荒的政策。明太祖朱元璋公开号召百姓可以尽力气开荒，而且能开多少就开多少。开荒田土还受到政府的优惠，宣布谁开的荒就是谁的产业，可以优免三年赋税，甚至宣布永不起科。与此同时政府还实行强制移民，移狭乡众多人口到缺乏劳动力的宽乡去开垦土地。这是一种劳动力的调配工作，是使劳动力固着于土地上的有效办法。接着就是政府为了巩固上述各项政策成果，确立了严密的户口制度，规定军、民、匠、灶等户籍，各种户籍的人之间，不容变换，也不准随意移徙，违禁逃徙者，罪至充军。这一法令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是稳定并加强封建制社会结构的大法。随后又制定了户口黄册和鱼鳞册，目的就在于从人口和土地的封建关系上巩固明初建立起的封建秩序，并给予国家立法的保障。但是这种新的秩序，从建立之日起，就不是新的事物，也不是发展了的事物，而是从公元8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封建制步入后期的社会结构在新形势下的继续而已。明王朝的统治者经历三四代人的努力，建立起来的七十多年经济发展的成果，对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但是它应当属于宋元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范畴。中国封建制社会还未真正进入它的晚期阶段。

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发生新的也是重大的变化大约在公元15世纪中叶以后。这个变化是伴随着明王朝的衰弱开始的。

公元15世纪中叶以前的半个多世纪中，封建制小农业经济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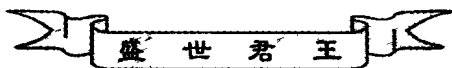
小生产者的地位是比较稳定的。在经历七十多年后，社会生产力发展了，但这种小农经济与生产的发展不相适应了。大约在宣德末年显示出一种危机。贵族大地主扩展和地方大地主的土地兼并急速进行。从北方的贫困地区到南方的经济发达地区的土地兼并狂潮，有如洪水猛兽吞噬着各地的小农业经济，驱赶着大批小农从土地上流亡。大批官田、屯田成为皇官庄田，大批民田沦为大地主豪强的田产。被从土地上排挤出来的流民，估计全国有几百万之多。他们几乎在同一个时间内、同一个地域范围内，被一股兼并狂潮从土地上驱走，往往形成有成千上万男女老幼的几大股流民群团，四处流移，寻求活命。北直隶、山西的流民先流向河南，会合河南的流民，南下湖广的荆襄地区。江南、江西的流民也西去荆襄地区。四川和西北地区的流民则向陕南汉中地区集中。沿海地方如山东、浙江、福建、广东等省的流民，一部分流向内地，一部分出海谋生。于是出现了三个流民集聚点：一个在荆襄山区，那里聚集了上百万的流民，在那里垦荒或租佃土地，或经营小商业为生。他们暂时摆脱了土地兼并的威胁和官府催逼赋役。另一个流民集聚点是汉中地区，情况和荆襄地区差不多。最后一个是东部沿海和近海范围。流民一部分进入几个周边国家或地区，如日本、吕宋（菲律宾）、爪哇（印尼）、满刺加、暹罗（泰国）、安南（越南南部）等地或更远的地方，后来成为华侨。而更多的沿海流民则受雇或在强迫的情况下加入了中国沿海的海盗集团。促使农民从土地上流亡，除了土地兼并之外，还有苛重的赋役，无艺的陪纳追征。“土木之变”以后，蒙古势力的不断侵害，加上 15 世纪中叶，中国大陆的反常气候影响，北方久旱，南方洪涝，农业显著减产，形成大面积饥饿



区。种种原因促成了从宣德末年开经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等朝历时百多年的大流民运动。它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晚期之前的一种阵痛。

由于公元15世纪中叶以后持续百多年大流民运动影响所及，使明初比较稳定的社会，开始动荡不安。长期动荡的结果，使中国的封建社会内部结构发生某些变化。原来的结构要求适应这些变化，也就必须调整某些机制。比如原来在农村，劳动者大多数附着于土地上，经营着小农业生产，市场商品经济并不发达。自从大批农民离开土地，到处流浪，城市人口遽然增加，但城市的手工业和商业服务业当时不具备容纳较多劳动力的条件。社会上普遍感到人口和劳动力过剩的危机。这种现状导致两个结果，一是流民为了生存而出卖劳动力的竞争加剧，出现了出卖劳动力的劳务市场。二是货币可以比较容易地购买到廉价的劳动力。

农民从土地上逃亡流移，他们实际上在摆脱封建的徭役负担，封建国家对他们的人身束缚已被削弱。他们之中相当一部人找到谋生之路，但大多数人只能沦为乞丐、流浪汉、盗贼。大批形形色色的人流浪于各个角落，大大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与动荡。大约从正统时期开始，各地的起义者骤然增多起来。明朝政府为了缓和流民运动带来的危机，不断以皇帝的名义下达新的流民赦罪令，废弛明初以来对移徙者处以充军罪的法令，申明对流民可以免罪，凡愿意回乡者，官府拨给荒地，并免税三年；不愿回乡者允许自开土地安家，编入当地户籍。这些流民法令虽曾起过缓和流民问题的作用，但产生流民现象的根源，始终没有改变，社会的安定也就不会出现。



流民问题对明王朝的财政收入构成严重的危机。因为明朝政府的财政以赋税收入为大宗，而这种财政收入又是以黄册和鱼鳞册为法律依据而征收的。黄册、鱼鳞册的基础是户籍与土地占有关系，两者如能保持相当稳定的关系，就可以保持一个大体不变的财政收入。农民的逃亡流移，离开土地，使户籍与土地关系一齐紊乱，势必造成人去役存、产去赋存的现象。官府为维持税收水平，就只能将已逃亡农户的负担转嫁到未逃亡的农户头上，叫做陪纳，陪纳又驱使未逃的农户逃走。这就使流民不断发生，流民像浪潮一样，向前滚动，不易停歇下来。流民运动持续百多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黄册、鱼鳞册虽然早已成为与实际完全不符的一堆废纸，但明朝政府还是不肯舍弃它们。就是因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以征收赋役。流民问题对赋役征收最直接的威胁是役的征取，役的征取对像是人，人既脱户籍，役也就无从征起。这就是为什么在 16 世纪 80 年代，明朝政府必须把“役”转到“赋”上，即把“役”转由田赋来负担的原因。在各地试行之后，一条鞭法终于成为 16、17 世纪以后中国封建王朝的惟一重要税法。

公元 15 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社会的商品经济有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这是由于唐中叶以来东南广大地区的开发，这里农工业生产条件比较优越，商品经济经过曲折的道路而发展起来。在明初经济恢复的条件下，商品经济找到一个发展的契机。大流民运动在震荡瓦解着封建经济结构，也给商品经济发展以机缘。流民的全国性流动，处处打开封建地域的闭锁性；南北商品实现长途贩运，又给商品经济的发展以活力。原料、劳动力一齐具有商品性质



之后,使商品生产大大地发展起来。但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的条件却不具备。雇佣劳动者虽然充斥各地,但没有城市经济的发达和手工业工场规模的扩大作条件,资本与自由雇佣劳动力之间的结合十分困难。这种城市市场狭小的现实,逼使大批流民从土地上出来,又只能回到土地上去的现象十分严重。中国虽大,但市场却十分狭小;中国的自由劳动群虽众,但与资本结合却困难已极。这就是15世纪中叶以后,中国虽然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萌芽始终是萌芽,而得不到充足发展的经济结构方面的原因。

明代的中国社会是充足发展了的封建制社会。它自身具备着自我调整或修补的机制,也有着完备而结构严密的上层建筑,对于巩固封建社会基础,起着不可低估的反作用。但是明代中国的封建社会还是进入晚期。虽然封建制和封建贵族阶级仍然居于统治地位,但是它已经衰老。好似一间老屋,漏隙破绽百出,每一阵风吹来,它几乎都要发出几声呻吟。几百年的风风雨雨,这间老屋竟然没有全垮下来,原因何在?答案当然是我们上面所提出的那些原因。但除此之外还要考察一下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封建贵族大地主的情况和他们在这里所起的作用。

明代的贵族阶级是明初就形成的,代替了蒙古贵族在全国的统治。它们是明朝皇权的阶级基础。明太祖朱元璋把二十多个子侄分封到全国各地,目的当然是为了巩固并扩大皇权。但是他有一种远虑,就是他的子子孙孙是不是都有能力和经验做好皇帝?于是他搞了一套《祖训》作为子孙世守的大法。在皇位继承、皇族内部关系、皇帝要遵守的法则、用人行政的规范、不许变乱“祖制”

盛世君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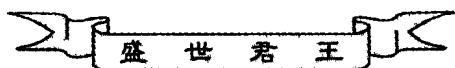
等方面都作了规定。对地方到中央的政权结构都作了重大调整，废掉地方的行中书省和中央的中书省丞相制。他扫除了子孙当皇帝的一切障碍。明太祖有一件事出乎他的盘算，他死后不久，就爆发了他儿子抢他孙子皇位的斗争，而且打了一场战争。但另一件事情他却想到了，那就是他的后世子孙，都是些养在深宫、不晓世事的贵族公子哥儿，怎么能治理国家，保住江山呢？在他生前就立孙子朱允炆为皇太孙。在他死后，朱允炆当上皇帝。朱元璋把皇位的继承中间隔了一代人而就交给了第三代，这是一种激化矛盾的作法。因为第二代人当时大都健在，权力的争夺，就成为不可避免之事。

朱元璋的第四子朱棣从侄子手中夺得皇位之后，当了 22 年的皇帝，最后死在北征蒙古归来的路上。他的儿子朱高炽已经 46 岁，屡次监国，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继承人。但是朱高炽在位不足一年就死去，由朱棣的孙子朱瞻基继位。朱瞻基是一个年方 26 岁的青年，有一定的政治经验，而且是明朝皇帝中文化水平较高的一个，平常可以同儒臣讨论诸如历代户口增减与国家兴衰关系的问题。朱瞻基在位 10 年死去，皇太子朱祁镇继位，是为英宗，距朱元璋第一代已经是第五代皇帝了。朱祁镇做皇帝时才 9 岁，不过是现在小学二三年级的小学生，谈不上什么政治经验和阅历，而且上有皇太后，下有顾命大臣，中间有个贴身的大太监王振，似乎这些话都要听，做错了什么事，还要跪在太后面前听训话。直到正统六年他才正式亲政。七年太后死去，大臣杨士奇等又相继离去，大太监王振的势力已成，遂控制了这位刚刚 15 岁的少年皇帝和朝政。明太祖朱元璋所担心的事情，果然出现了。王振专断朝政，怂

明世宗朱厚熜

愚朱祁镇亲征瓦剌，朱祁镇被俘，北京被围困。朱祁镇之弟朱祁钰即位，在于谦等人的努力下，瓦剌势力被打退，形势转危为安。朱祁镇被放还。几年后，朱祁镇复辟。这场复辟是在贵族、武臣、宦官等势力的支持下实现的。从此之后权贵势力大张。他们在政治上结成贵族大地主集团，从皇帝那里获得了极多的封建特权，给他们发展大地产，经营垄断性商业等活动提供了国家权力的支持。这个势力通过皇帝和皇帝信任的宦官以及被收买的朝臣来控制或干预朝政。他们是腐败政治的渊藪，也是明朝这所大厦的蛀虫。同时他们所代表的政治势力也是贵族阶级中最没落最反动的部分。

公元 15 世纪中叶以后，伴随社会危机和明朝的政治危机，以地主阶级知识层官员为主体的中央与地方官僚集团势力发起挽救危机的政治运动。也可以说是他们的一场自救运动，就是想通过调整政策以达到政治改革的目的。在保持封建制度不变的范围内，克服危机，使动荡的社会安定下来，政治腐败得到肃清，强国富民，恢复早年大明帝国的繁荣。在经济问题上，江南地区的城乡士大夫倡导均田、均赋运动，既要公平负担国家赋役，又要求克服赋役征取上的各种弊端。一些地方官在江西、江南等地开始了施行一条鞭法赋役制的初期试验。东南沿海各省不少人在呼吁开放海禁，发展海外贸易。在政治问题上，要求限制贵族大地主地产的无限扩张，主张彻底清查皇官庄田，制定法规，限制贵族占用数量。要求紧缩诸王宗禄的庞大开支，制定贵族封爵宗禄的五世递减办法，以抑制贵族人口和宗禄开支的过快增长。朝中官员曾发动过几次相当规模的政治活动，如反汪直西厂运动；谏止武宗南巡的活



动；大礼议活动；反严嵩活动；东林党活动等等，都与这场持续很久的政治改革运动有或多或少的关系。

明神宗朱翊钧和英宗朱祁镇一样，也是以 9 岁娃娃登极坐殿当皇帝的。按照明朝的惯例，凡遇到这种情况，往往是由皇太后与阁臣、大太监结成皇权“代理人”形式来实现统治。英宗如此，神宗也如此。内阁首辅张居正与大太监冯保秉承皇太后旨意，主持了万历初政。皇权相对减弱是朝臣推行改革主张的极好时机。由于皇权和贵族势力相对减弱，使触及贵族阶级利益的改革措施的实行，减少了阻力。张居正改革活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加强专制统治体制的前提下进行的。张居正推出的官吏考成法，目的是制止官僚政治的腐败与提高行政的效率、效能。换言之，就是在于排除贵族势力对政府行政的干预与腐化。丈量土地与推行一条鞭税法，旨在限制贵族大地主势力的大地产扩展，整顿基础财政，增加政府收入，实现“富国强兵”的较长远目标。因为张居正的改革活动是在明朝皇权相对减弱间隙中出现的，而且皇权专制统治实质是封建贵族阶级的专制统治，它会排斥任何改革的企图。张居正的改革也只能是昙花一现。神宗一天天长大，由一个 9 岁的孩子，长成为 19 岁的少年，贵族势力和神宗都会自然地要求恢复他们的皇权绝对权力。自此以后，贵族大地主阶级以皇权形式专政，就成为政治倾向的主导趋势。张居正之后，一直到明朝灭亡，都未再出现过任何改革的机会。但是地方的或各种政治集团之间在政治改革问题上的斗争，却始终未有停止。万历年间的东林党争，天启时的东林党与宦党的斗争，都具有这种斗争的性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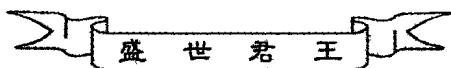
明武宗朱厚照的正德年间，在君臣之间、臣臣之间、朝野之间，

明世宗朱厚熜

关于“祖训”、“祖制”问题，皇帝是否应当按传统规范自己行动的问题，君主权力与内阁权力的关系问题，宦官专政问题，该不该限制贵族经济权益膨胀的问题等等，都有过不同的意见纷争。大约从弘治时开始，朝臣们集体进行政治请愿的事情就时有发生。正德朝有一百几十位朝臣为谏止武宗南巡而举行过大请愿，其中受廷杖而死的就有十几个人。嘉靖朝的“大礼议”参加辩论的朝臣就有几十人，不同意见被贬退的官员不在少数。这些都反映出时代的动荡，王朝的衰落，所给予权力阶层的是激烈的竞争，而给予非权力阶层的则是不断的起义。

正德朝在明代历史中是一个充满矛盾、危机的时期。正德朝一共 16 年，藩王叛乱就有两次。正德皇帝是朱厚照，但是却出了一位“立地皇帝”刘瑾，专权祸国。人民反抗起义有数十次。北方民族大规模侵扰就有十来次。贵族、宦官势力把持朝政，政治腐败达到极点，朝野之间充斥着政治阴谋。明王朝似乎已濒临末日，但是毕竟没有灭亡。

明世宗朱厚熜以地方藩王入主大统，他的初政就是反正德弊政，并吸收皇兄朱厚照重用宦官的教训，压制了宦官势力的抬头，重用内阁辅臣，加强皇帝、内阁、六部这种体制。议“大礼”，重用新进士充内阁辅臣，以排斥旧权贵和旧朝臣的势力。一时在政治上似乎有了起色。但是世宗所搞的“初政”，不过是以新贵族代替旧贵族，新朝臣代替旧朝臣，政权的贵族大地主阶级基础并没有改变，仍然搞的是贵族政治。所以世宗朱厚熜的嘉靖朝并不比正德朝好多少，内阁里各种政治派别的斗争十分激烈。世宗朱厚熜不像武宗那样，到处巡幸，而只是去了一次湖广老家，就退居深宫参



玄问道。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遭到海盗的酷烈侵害，北部边境蒙古势力大举入边骚扰，因此军费开支十分庞大。为了筹措军饷，就拼命增加赋税。自此以后，田赋加派不断，直至明亡。

隆庆朝的穆宗朱载堉在位 6 年，有意无意地办了两件有意义的事。一是在当时形势推动下，有条件地开放了海禁。这对于国内经济和私人贸易的发展，都起了相当的刺激作用。二是与蒙古势力达成和解，封蒙古俺答汗为顺义王，开始了蒙、汉人民间的和平往来，相对地缓解了明朝北部的防御危机。

明神宗朱翊钧是一个既精明又疏懒的贵族子弟。9 岁登极，15 岁亲政。他不如武宗朱厚照那样生活过分荒唐，但贪财如命的程度则超过武宗。他同武宗一样也是一个酗酒者。臣下雒于仁给他上了一本，名为《酒色财气四箴》，劝他克服这四个缺点，可见他这四样都占全了。他读的书比武宗多，知识也多，见识也略胜一筹。在任用阁臣与宦官方面都表现出他的统治能力也比较强。有人说万历朝中央政府缺官严重，政事废弛，但朱翊钧抓住了内阁和司礼监这两个皇权的“车轮”，仍然可以控制着局面。在立太子问题上，神宗宠爱郑贵妃，使问题复杂化。于是什么“争国本”、“挺击”等事件，成为朝廷之上争论的大题目。太子朱常洛已经 38 岁，神宗才死去。朱常洛即位一个月，就在“红丸”疑案中死去。熹宗朱由校继位，这位天启皇帝是一个 15 岁的少年，在政治上是个低能儿，但是在手工工艺上却是个天才。他的木工、漆工水平都超过了当时的一般工匠。他即位当时就成为朝臣和宦官争夺的对象。争夺结果，东林派失手，朱由校被宦官势力夺得，于是出现了大宦官魏忠贤的专权，迫害东林党人和朝臣反对派，并与一批投靠的官